

義共本年大選前的政治策略

陳 墘 津

一、前 輯

義大利人今（一九八一）年又將面臨國會選舉的政治危機。事實上，自一九七六年以來，這種國會選舉所造成政治危機，在義大利的諸政黨之間，就一直沒有能够好好的解決過。七六年這年，義大利最大政黨「基督教民主黨」（Christian Democratic Party）三十多年來的政治領導權，受到義大利共產黨最大的挑戰。「基督教民主黨」在這年國會選舉中，只得到百分之三十一點八七的選票；而它的對手義共却得到空前所未有的百分之三十四・四的選票^①。雖然「基督教民主黨」黨主席莫洛（Aldo Moro）形容這次選舉，是產生了「兩個贏家」（two winners）^②，但就是這兩黨的任何一黨若有其他小黨派的合作，還是沒辦法組閣執政。義共總書記貝林格（Enrico Berlinguer）早在前一年的地方選舉勝利時就已宣布，「沒有我們，就不能再治理義大利了」^③。的確，義大利此後的政局，如果沒有義共的支持，就會面臨了危機。

一九七六年以來義大利的政治危機，是靠義共的棄權、容忍以及合作^④，才安然渡過。果然在七九年，當義共認為時機不容錯失，就和基督教民主黨簽訂了聯合政府的協議，由阿德羅第（Giulio Andreotti）擔任首相，組織相對多數的聯合政府執政權的

註^① See Muriel Grindrod, "Statement in Italy's Election," in *The World Today*, July 1976; H. Penniman edited, *Italy at the Polls: The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of 1976*, (Washington: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1977).

註^② See Hansjakob Stehlé, "The Italian Communists on the Parliamentary Path to Power," in *The World Today*, Vol. 34, No. 5, (May 1978), p. 176.

註^③ Christopher Seton-Watson, "The PCI's Taste of Power," in *In Search of Eurocommunism*, edited by Richard Kindersley,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1), p. 147.

註^④ 「基督教民主黨」從一九七六年八月起，是經過三次與義共的協議，才取得由阿德羅第（Giulio Andreotti）擔任首相，組織相對多數的聯合政府執政權的。見H. Stehlé, "The Italian Communists on the Parliamentary Path to Power," p. 175; C. Seton-Watson, "The PCI's Taste of Power," pp. 147-148.

它繼續支持腐敗、醜聞百出與貪污案件層出不窮的「基督教民主黨」政府時，後者只好宣布解散內閣，舉行改選。

一九七九年，義大利舉行國會議員選舉，義共慘遭滑鐵盧，只得百分之三〇·四的選票；而「基督教民主黨」只比七六年掉百分之〇·四的選票。不過，即使這樣，「基督教民主黨」做為一個勝利者，還是極難取得國會多數，組成內閣，成立一個新政府。七九年大選後的內閣，是「基督教民主黨」歷經艱難，經過社會主義黨領袖克拉克西（Bettino Craxi）的容忍，才勉為其難的由黨領袖柯西嘉（Francesco Cossiga）聯合其他小黨派組成的^⑤。在義共堅決的反對下，自然這個內閣的壽命也不久長。

因此，歷史與現實的情況似已表明：環境是對義共有利，而「基督教民主黨」控制義大利政壇的情勢則越來越困難。而今年義大利的國會大選，正是考驗義共的努力能達到什麼樣成果的一次重要選舉。

二、義共對其七九年以前政策之檢討

在七九年義共於國會選舉失敗後，它立即重新檢討並佈置下次大選的選舉工作。首先，是澈底的檢討黨內過去「歷史性的妥協」（Historic Compromise）的政治路線。這個路線，是貝林格於一九七二年三月到七三年十月間，鑒於義大利經濟危機、階級層化、社會問題的壓力以及考慮到關於智利阿葉德政權的經驗等等而後提出的^⑥。在這個路線下形成與「基督教民主黨」合作的政策，曾遭義共黨內左派分子的批評^⑦。當時，貝林格提出「歷史性的妥協」路線的目的，是希望能先挽救義大利資本主義發展的危機，穩住義大利的現狀，使義共能在和平中求發展，逐漸取得選民信任。同時，在「基督教民主黨」內部的政治立場與路線逐漸改變時^⑧，義共與之合作，亦可趁機吸收「基督教民主黨」內的天主教共產主義運動份子，再聯合中產階級的力量，以

註^⑤ See Giacomo Sani, "Italy," i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Affair, 1980*,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0), p. 183.

註^⑥ See Grant Amyot, *The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London: Croom Helm, 1981), pp. 201-206; 貝林格是在義共黨第十三次黨大會上，首次提出聯和「基督教民主黨」合作的類種「歷史性的妥協」路線。貝林格的報告，詳見 A. Tato edited, *La questione comunista 1969-1975*, Vol. 2, (Rome, 1975), p. 415. 貝林格正式提出「歷史性的妥協」路線，是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

註^⑦ See M. J. Sadaro, "The Italian Communists and the Politics of Austerity," in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Vol. XIII, Nos. 2&3, (Summer/Autumn 1980), pp. 227-232.

註^⑧ 在一九七〇年七月前後，義大利「基督教民主黨」的政府柯隆姆波政府（Colombo government）上臺，改由中間偏左的亞得歐第上臺。他的政策，是較偏向於對義共有利。同時，亞得歐第個人與義共有些領袖的私交亦不錯。

防止新法西斯主義和反動勢力的出現，而開創義共取得政權，走向社會主義的「光明大道」⁽⁹⁾。許多共產黨人反對貝林格這個路線，主要是因為它像改革主義者的綱領，基本上模糊了（資產階級）「民主」與「社會主義」階段的明確界線⁽¹⁰⁾。

義共在七六年所得高額選票，曾一度平息了一般義共黨員對「歷史性妥協」路線的疑慮，但七九年義共在國會大選中挫敗之後，懷疑貝格林「歷史性妥協」路線是否正確的意見，再度產生。

貝林格曾在一九七九年義共中央委員會上檢討大選挫敗的原因。他認為，「歷史性妥協」這條路線，還是正確的，只是運用的方式常常不對。他說，把黨的路線附屬於選舉的考慮之下，這是社會民主黨的作風。同時，他對於印革拉歐（Pietro Ingrao）（義共左派領袖）所提放棄與「基督教民主黨」聯合，而與左派聯合的論調，堅決反對。他認為，用左派聯合來代替「歷史性妥協」的路線，是不切實際的做法。假如「基督教民主黨」的政府被趕下臺來，那麼義大利馬上就要發生政變⁽¹¹⁾。義共這次大選失敗的真正原因有四：一是歐美政府的壓力；二是「基督教民主黨」沒能立即實行義共與之協議的改革綱領；三是義共黨內組織、工作與指揮有缺點；四是東亞地區共黨國家之衝突，損害了年輕一代對社會主義的印象⁽¹²⁾。

貝林格對「歷史性妥協」路線的反省，其實在現實上是大有問題的。他沒有完全衡量清楚「基督教民主黨」對義共的策略問題、黨內與選民的感受，其他左派政黨的變化，以及國際情勢的變遷。七六年三月「基督教民主黨」秘書長札克尼尼（Benigno Zaccagnini）重新當選之後，明白表示「基督教民主黨」是反對「歷史性妥協」路線⁽¹³⁾的。它反對的理由是：義共的提議，在執政黨與反對黨之間創下了不可接受的混淆。對「基督教民主黨」而言，義共的轉變尚未完全，還不能予以信賴。因此，「基督教民主黨」認為，兩黨之間的對話與交流是必要的，可藉以表明雙方的立場，但除此之外一切都是不成熟的。不過，「基督教民主

註⑨ G. Anyot, *op. cit.*, pp. 202-206.

註⑩ 義共多數黨員接受「歷史性妥協」的路線，但大多數的黨員認為它只是義共以左派聯合政府方式最後取得政權，或單獨取得政權的一種策略。一九七七—八年在義大利愛米利安邦（Emilian）的問卷調查顯示，百分之六十七的義共黨員接受「歷史性妥協」的政策，但認為它只是一種策略；另百分之三十的黨員完全不接受這個政策；只有百分之一的黨員全盤接受這個政策，同時認為它是一種長程的戰略。見 *Ibid.*, pp. 222-223。亦請參閱 Martin Clark 和 David Hine 的說明。見 Martin Clark and David Hine, "The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between Leninism and Social Democracy?" in *The Changing Face of Western Communism*, (London: Croom Helm, 1980), pp. 125ff.

註⑪ 貝林格的意見，見 *L'Unità*, 4 July, 1979; *Stern*, 16 Aug. 1979 p. 133; 參看 G. Anyot, *op. cit.*, pp. 226-227。

註⑫ G. Sani, "Italy," pp. 182-183.

註⑬ See Giacomo Sari, "The PCI on the Threshold," in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XXV, No. 6, (Nov-Dec 1976), p. 43。關於「基督教民主黨」當時的戰略，見 Giuseppe Di Palma, "Christian Democracy: The End of Hegemony?" in Howard Penniman, ed., *op. cit.*並參「基督教民主黨」內部對「歷史性妥協」的論證，亦請參 Martin Clark and David Hine, *op. cit.*, pp. 124-125。

黨」在義大利的政壇中，沒有義共的支持，仍然很難統治。因而，「基督教民主黨」的戰略是：讓義共成爲既不是一個執政黨，又不是一個反對黨的黨派^⑯。換句話，義共不能參政，但可以參議政策，沒有決策權，但却須與「基督教民主黨」共負行政責任。「基督教民主黨」這個戰略，是使它能苟延殘喘地統治義大利到八〇年代的基本原因。「基督教民主黨」的目的，也就是讓義共扯上它自己根本不必擔負的行政責任，以便在政策有失誤時，共同承擔選民的責罵，而「基民黨」却同時保住了統治權^⑰。但是貝林格却天真的認爲，「基督教民主黨」不讓義共參政，只是因爲害怕義共危及它的「權力體系」而已^⑱。不過，貝林格自己一直到七九年三月止，都還認爲他在一九七六年的決定，是有價值的，只是「基督教民主黨」回報的太少」。

也許，「歷史性妥協」路線只是義共領導人和「基督教民主黨」的妥協，義共黨員與支持義共的選民，並不認爲他們可以與「基督教民主黨」合作。在一九七七年，義共拉攏教會時，義共老黨員帕雅他（Gian Carlo Pajetta），就認爲義共有變爲「第二個天主教政黨」的危險。義共主管地方事物的代表哥殊塔（Armando Cossutta）也表示，義共的「歷史性妥協」路線是投降政策；義共黨已失去它的特徵^⑲。因而，義共自一九七六年以後，每支持一項法案，就失掉一批黨員；每舉行一次選舉，就失掉一批選民。義共在一九七八年失掉兩萬五千名黨員，在一九七九年損失兩萬九千名黨員，在八〇年丟掉七萬名或更多的黨員^⑳。對義共與「基督教民主黨」的妥協，選民的反應更大。義共在七七年提出反通貨膨脹的「節約政策」，使工人階級大受其害，選民在這年四月舉行的地方選舉中，使義共只得到百分之廿八·八的選票（七六年是百分之三八·三）。接着，工業復興法、創造就業法、公平租借法與保護警察法等等之議案，使義共在七八年五月的地方選舉中，又丟掉了百分之九的選票（一九七六年是百分之三五·六；七八年是百分之廿六·五）。最後，在七九年的國會大選中，義共甚至把七六年從南方、青年一代選民以及大都市邊沿貧民區選民贏來的選票，全部輸光^㉑。選民與義共黨員對於「基督教民主黨」沒有辦法解決義大利自七〇年以來的經濟危機，感到不耐，但是對於義共堅決支持「基督教民主黨」政府的立場，更覺得困惑與失望。選民只好改變其支持的對象，黨員亦紛紛脫黨。在七九年後，義共黨內瀰漫着一股十分濃厚的消沉氣氛。

註^⑯ See Hansjakob Siehle, "Italy between Compromise and Paralysis," in *The World Today*, Vol. 35, No. 12, (Dec. 1979), pp. 486-487.

註^⑰ C. Seton-Watson, *op. cit.*, p. 153.

註^⑱ See *Panorama*, 29 May 1979.

註^⑲ "Italy's Communists," in *The Economist*, (Oct. 25, 1980), p. 11.

註^㉑ *Ibid.*, p. 12.

註^㉒ C. Seton-Watson, *op. cit.*, p. 154.

貝林格自己感覺到他在義共黨內的地位不穩^{②0}，所有批評的箭頭都對準了他，加上「基督教民主黨」政府對於政策的執行推拖搪塞後^{②1}，他才覺察到義大利的現實正在清算着他的「歷史性妥協」路線。當然，義大利左派政黨「社會主義黨」的慢慢崛起，以及國際情勢的變遷，也幫助他瞭解到「歷史性妥協」路線是不合現實的政策。八〇年末，貝林格決定放棄這種路線^{②2}，開始對「基督教民主黨」的聯合政府，採取強硬激進的路線。這種路線的改變，反映在義共從八〇年起，所採取的一連串活動上。自然，這種路線，是義共內部壓力最强的左派路線。

貝林格的激進路線，主要是對「基督教民主黨」政府採取威迫的態度，並儘量反映義大利各地、各階層選民的要求。在八〇年六月義大利地方選舉時，貝林格就試圖利用選舉的機會，在參眾兩院取得議員們支持，在議會中對總理柯西嘉的兒子參與赤軍旅一事，展開調查，以迫柯西嘉下臺^{②3}。同時，趁機批評柯西嘉政府，說它沒有辦法有效的處理通貨膨脹、恐怖主義與國際事務，因而使義大利步入更深的危機中。但於八月取得議院信任投票支持的柯西嘉^{②4}，却因新的經濟政策不獲議院支持，而於九月廿七日下臺。十月初，義共一面提出參與新聯合政府的要求，一面鼓動九月末於土林(Turin)發生的飛雅特(Fiat)汽車製造廠工人罷工運動，使義大利的政治危機加深^{②5}。「基督教民主黨」主席弗蘭尼(Arnaldo Forlani)，於十月受總統帕爾梯尼(Sant'Andrea Palazzini)指揮罷工，這是戰後以來義共所未有的激烈行動。

註^{②0} 在七九年大選後，義共左派領袖印革拉歐會試圖組織一種批判貝林格路線的運動，來迫使貝林格下臺，以便取而代之為義共之總書記，但沒成功。繼印革拉歐之後，很可能取代貝林格為總書記的，有三個人。一個是亞曼都拉(Giorgio Amendola)(義共右派領袖，八〇年逝世)的繼承人拿波里他諾(Giorgio Napolitano)，另一個是黨的副主席拿塔(Alessandro Natta)和主管地方事務的哥殊塔。因此，只要貝林格路線不變，他馬上就要面臨被清算的命運。這也是貝林格不能堅持「歷史性妥協」路線的原因之一。見*"Italy's Communists,"* p. 10.

註^{②1} 「基督教民主黨」政府的改革，令義共多數黨員大失所望。對於這過程的分析，見C. Seton-Watson, *op. cit.*, pp. 148-154; G. Amyot, *op. cit.*, pp. 212-229.

註^{②2} See "Berlinguer Wants to quit Italy's 'Compromise,'" in *Baltimore Sun* 8 Dec., 1980.

註^{②3} See Sari Gibert "Communists Falter In Italian Voting as Center-Left Gains," in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10, 1980; Henry Tanner, "Italy Vote Retains Balance of Power," in *New York Times*, 11 June, 1980; "Vote of Confidence," in *The Economist*, June 14, 1980.

註^{②4} 張啓華，「意大利新的政府危機」，《人民日報》，一九八〇年十月廿日。

註^{②5} See "Prime Minister of Italy Wins Vote of Confidence," in *New York Times*, 1 August, 1980.

註^{②6} "Italian Communist Demands," in *Washington Post*, 1 Oct., 1980; Sari Gibert, "Italian Communist Adopt Hard-line Tactics as Popularity Diminishes," in *Washington Post*, 5 Nov., 1980. 在飛雅特汽車製造工廠工人罷工時，貝林格甚至到土林指揮罷工，這是戰後以來義共所未有的激烈行動。

dro Pertini) 之命，組織一個包括「基督教民主黨」、社會主義黨、共和黨及社會民主黨的新中左派聯合政府[◎]。義共被排擠出政府的權力中心，自然激烈反對弗蘭尼政府。尤其，它仍是一個由「基督教民主黨」人擔任總理的政府，義共沒有辦法忍受這點。

弗蘭尼政府組成後，義大利的情勢對它不利。義大利從八〇年秋季起，連續爆發油稅醜聞案，同時義大利南方有大地震，以及赤軍旅綁架案；次年五月，又扯出有多名政軍要人參加「共濟會」(Masonic) 支會秘密組織案。在政府內，聯合政府的各黨派間，對經濟與社會政策諸問題看法不一致，相互傾軋，迫使弗蘭尼時常不能不用信任票方式，來通過普通的措施案[◎]。義共此時正好伺機抨擊弗蘭尼政府，指責地震的賑災舉措不當，以鼓動義大利選民的不滿情緒[◎]。

結果，弗蘭尼不能不下臺。在八一年六月義大利地方選舉過後，共和黨領袖斯帕多利尼 (Giovanni Spadolini) 奉命組閣。斯帕多利尼的政府，是由共和黨、社會主義黨、基督教民主黨、社會民主黨和自由黨組成。斯帕多利尼本人穩健，親美。他出任總理後，兢兢業業，打算先以一個短程的計劃，解決恐怖主義、貪污腐敗、通貨膨脹以及義大利在整個西半球防務上的角色等諸問題，以便穩住政局；再以長程計劃，更新政府的政治體制[◎]。他和社會主義黨都認為，「基督教民主黨」統治了義大利卅六個年頭後，就如用壞了的輪胎，不能再用了；而義共在聯合政府的內閣內，則如脫疆之野馬，不能駕馭。這樣一來，只有共和黨和社會主義黨能治理義大利了。不過，斯帕多利尼並沒有忘記：義共在義大利仍有相當的影響，尤其是義大利政府如想有效的解決通貨膨脹問題[◎]，沒取得義共所控制着的全義大利最有力量之工會的諒解，就不能達到。所以必須與義共，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

義共此時在斯帕多利尼政府中的地位，顯然與七六年不同。義共在當時，仍然面臨着頗有力量的基督教民主黨政府；現在，基督教民主黨正如洩了氣的皮球，組聯合政府的其他小黨，也沒有一個勢力可以比得上義共，所以斯帕多利尼政府的命運，好像就是操在義共手上一樣。目前義共只在等待時機成熟，出掌義大利政權，這也是為什麼義共還不急於打垮斯帕多利尼政府之原因。

註[◎] "Political Consultation in Italy," in *Washington Post*, 7 oct., 1980; "Italian Seeks to Form Government," in *The New York Times*, Oct. 7, 1980.

註[◎] See Sari Gilbert, "Italian Coalition Falls in Masonic Scandal," in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27, 1981.

註[◎] See "Berlinguer Wants to quit Italy's 'Compromise,'" in *Baltimore Sun*, 8 Dec., 1981.

註[◎] See Adolfo Battaglia, "In Italy, a Deep Change," in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 1981.

註[◎] 關於義大利的通貨膨脹與經濟問題，見郁葱，「意大利經濟的『困境』」，出自〔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四日第七版。

三、對社會主義黨的謀略

對義大利的社會主義黨進行謀略戰，是義共本年大選前部署的競選策略。義共未來能否漸漸的掌握政權，絕大部分還要看義大利這個第三大黨能不能夠傾向義共。

義大利社會主義黨從戰後以來，一直都跟義共和「基督教民主黨」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在一九五六年才與義共鬧意見^㉑。當七〇年代初，貝林格提出「歷史性妥協」路線時，社會主義黨也表示過反對的意見。社會主義黨的反對是有其歷史上的原因。戰後，社會主義黨長期在義共與基督教民主黨這兩大黨的勢力壓制下求生存。而從六三一七五年間，它參與基督教民主黨的中左派聯合政府，失去了黨的社會主義色彩，而使義共有成爲義大利唯一的社會主義政黨之趨勢，這使它大爲着急。義共提出歷史性妥協的目的，是在於使義大利發生結構性的改革後，對義共有利，而使之逐漸取代基督教民主黨在義大利的領導力量。社會主義黨當然更加着急。因此，社會主義黨比其他各黨更反對「歷史性妥協」路線。社會主義黨認爲，領導義大利走向另一種民主，是它自己的「歷史任務」，不能讓義共強佔^㉒。

一九七五年九月，基督教民主黨主席莫洛發表公開演說，表示該黨未來可能跟義共在協議與綱領問題方面，直接對話商討。義大利社會主義黨有被背棄的感覺，因而力求在對基督教民主黨和義共兩大黨方面，有一個明確的策略。

七六年年初，社會主義黨決定採取一種兩面作戰的策略，不但不再與「基督教民主黨」組成中間左派聯合政府，它還力圖在政治上與意識形態上腐蝕義共的形象。這是社會主義黨「左派的選擇」（left-wing alternative）之基本策略。七六年七月，克拉克西取代馬提諾（Francesco De Martino）爲社會主義黨總書記後，在黨內左派領袖西哥諾里拉（Claudio Signorile）的全力支持下，大力推展這個基本策略，並爲該黨制定了一個「民主社會主義」新綱領。依這新綱領，社會主義黨試圖在有利時機，與義共組成一個由社會主義黨領導的「左派的選擇」典型之聯合政府^㉓。當然，社會主義黨認爲，實現這新綱領的先決條件，是義共必須首先與蘇聯斷絕關係，藉使義大利選民接納其爲民主政黨^㉔。

^㉑ See Wolfgang Berner, "The Italian Left, 1944-1978: Patterns of Cooperation, Conflict, and Compromise," in *The European Left: Italy, France, and Spain*, edited by William Griffith, (Lexington: Lexington Books, 1979), p. 33.

^㉒ Ibid., p. 23. 亦請參閱 G. Sani, *op. cit.*, p. 44.

^㉓ Wolfgang Berner, *op. cit.*, pp. 35-36.

^㉔ Ibid., p. 36; "Italy's Socialists: The Corkscrew rise of Bettino Craxi," in *The Economist*, Oct. 24, 1981.

至於如何使一個比社會主義黨陣容還強大的義共，在將來的「左派的選擇」之聯合政府中，聽命於社會主義黨呢？克拉克西採用一個巧妙的政治策略，希望能使義大利選民不但對社會主義黨有耳目一新之感，而且還使義共不能不按他的策略行動。

克拉克西首先在七六年國會大選後，力促基督教民主黨建立一個包含義共在內的聯合政府，以便讓義共分擔行政責任。後來這手段雖沒成功，但克拉克西還是從中折衝斡旋，終於讓義共與基督教民主黨合作；使義共成爲一個「不是執政黨的執政黨」，而大毀其形像。從七六年到七八年的幾次聯合政府之協議中，社會主義黨均採取這個政治策略。社會主義黨從七六年到八一年止，無論是地方選舉或國會大選，選票都有增加之趨勢⁽³⁵⁾。政治策略的成功，是其基本原因之一。

另外，克拉克西也採用了他自己的新社會主義哲學。他不但把黨徽的標誌鐵鎚與鐮刀，更換爲康乃馨，還採取有別於以前義大利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的做法：反對國有化與計劃經濟，反對利用核子能源，處處和義共互別苗頭。在七八年八月，克拉克西更公開攻擊義共支持「列寧主義的共產主義」⁽³⁶⁾，攻擊義共主張的歷史性妥協路線。

社會主義黨能在義大利採取這種策略，基本上是義大利的政治形勢，完全對它有利。基督教民主黨的勢力日趨衰微，義共又是不能公開露臉執政的政黨，好像目前的義大利就是社會主義黨的天下了。因此，在八〇年九月的新中左派聯合政府瓦解後，克拉克西就不斷的提出要做總理的要求。在八二年面臨選舉時，假如基督教民主黨還是拒絕克拉克西的要求，而義共又能滿足克拉克西的願望與要求，那麼大選後的義大利局勢會如何變化，就很難說了。只擁有百分之十左右選票的政黨，由於策略運用得當，也變成舉足輕重的棋子了。

面對着一個思想性質與自己相同、但來勢洶洶的社會主義黨，義共自始就小心翼翼地加以應付。與社會主義黨合作，原本也是歷史性妥協路線的內容之一，因此，與社會主義黨將來組織聯合政府，然後慢慢由義共來領導，義共並不感覺困難。義共要解決的問題，只是它如何在不違背自己的政策原則與利益下，來滿足社會主義黨的要求而已。

在七八年八月克拉克西攻擊義共時，貝林格於九月十七日在熱內亞（Genoa）演說表示，歷史性妥協路線是歐共主義的一個「第三條道路」的概念。這條道路是既不導向社會民主黨的道路，也不導向蘇聯的方向；他認爲應依據歷史性妥協的策略，發展出左派諸黨的聯合路線⁽³⁷⁾。不過，貝林格自己也知道，社會主義黨唯一害怕的，是義共和基督教民主黨的聯盟策略——歷史性妥協路線。所以，貝林格於七九年時，再向社會主義黨解釋，歷史性妥協並不排除其他種種政府形式的可能性；同年貝林格於接受

註⁽³⁵⁾ See *Ibid.*, "Italy's Socialists Gain in Elections," in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3, 1981; Sari Gilbert, "Socialist Party Scores

Significant Gains in Local Italian Voting," in *Washington Post*, 23 June 1981.

註⁽³⁶⁾ Hansjakob Stehle, "Italy between compromise and paralysis," p. 486.

Ibid.

訪問時，乾脆明白表示：歷史性妥協是一種政治戰略，而不是政府的形式^⑩。最後，連義共黨內與義大利選民也對歷史性妥協路線不滿時，貝林格索性於八〇年放棄此路線，以滿足各方面之要求。

社會主義黨要義共放棄列寧主義的原則，義共也力求讓社會主義黨滿意。七九年中的義共黨代表大會，修改許多條黨綱，以沖淡人們認為義共的行動是依據列寧主義的印象。八〇年尾，義共中央委員開會又討論了義共應如何擺脫教條主義等等問題。以上種種，都是義共希望把列寧的地位，降至完全不重要的程度。八〇年十月，貝林格在接受訪問時表示，義共現在只保留列寧主義的三件東西，那就是：工人階級需要廣泛的聯盟；工人階級內部的矛盾必須克服；黨應像歷史的產婆一樣，不能只等歷史時機行動^⑪。

對於社會主義黨要求義共參與西歐經濟共同體並與西歐國家或左派的政黨保持聯繫，義共也會盡力去做。七九年，義共頻頻派出各種代表團，訪問西歐各國的左派或共黨。例如：元月，帕雅他率領代表團走訪希臘兩個共黨(the KKE, the KKE interior)；同時期，一個義共代表團訪問瑞典社會民主黨領袖帕爾梅(Olof Palme)；一月，義共外務部的塞吉雷(Sergio Segre)走訪法國社會主義黨和荷蘭共產黨^⑫。貝林格自己亦於八〇年親往法國斯特勞斯堡(Strasbourg)，參與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

到目前為止，在與西歐保持聯繫方面，義共和社會主義黨還不能達成一致意見的，是參與歐洲經濟共同體和歐洲貨幣體系的問題。義共堅決反對上述兩種體制，因為，義共認為，義大利的經濟如果老依靠歐洲經濟體系，便將無法解除經濟危機，而走向社會主義。不過社會主義黨與義共之間對這問題的歧見，在將來並不是沒有化解的可能。

四、對蘇聯體制的批判

對蘇聯的體制進行批判，並且不惜與蘇聯決裂，是義共對社會主義黨提出的諸要求中，一個最明確的答覆；這也是義共對本年大選部署的最大策略應用。

以往，西方一般人，甚至是義大利選民，對於義共一方面批評蘇聯入侵捷克或違反人權，一方面仍與蘇聯來往的事實^⑬，都

註^⑩ Christopher Seton-Watson, *op. cit.*, p. 155.

註^⑪ "Italy's Communists," p. 10.

註^⑫ Giacomo Sani, "Italy," pp. 184-185.

註^⑬ 關於義共與蘇共以往的關係，見 Joan Barth Urban 對論。See Joan Barth Urban, "Moscow and the PCI in the 1970s: Kto Kovo?" in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Vol. XIII, Nos. 2&3, (Summer/Autumn 1980), pp. 99-167.

認為義共沒有誠意在西方民主的體制下生活。義共本身對這點，也頗感困擾。義共左派更時常針對這點，在黨內提出激烈的批評意見。

義共自八〇年初以來，對蘇聯的立場有較明確的表示。義共於八〇年六月，對蘇聯入侵阿富汗問題，展開前所未有的嚴肅批判。義共譴責蘇聯入侵阿富汗，是「違反國家獨立與主權的原則」，並且認為蘇聯此舉對世界和平已經產生危險性的影響⁽²⁾。根據義大利內外形勢來看，義共此時應該下個決心，與蘇聯決裂。但是貝林格並沒如此做。據貝林格的說法，義共要維護它自己的自主權，同時也要維持與蘇聯的一線關係；也就是還要對話⁽³⁾。不過，根本上，義共黨內是有所謂的「阿富汗派」(Afghans)⁽⁴⁾，強烈抵制貝林格與蘇聯決裂⁽⁵⁾，所以貝林格根本沒法進一步行動，這是貝林格不敢公開承認的事實。

八〇年末，貝林格才有更多的機會，來表明他對蘇聯的立場。由於義共黨內較親蘇的所謂「阿富汗派」——義共主席隆哥與右派領袖亞曼都拉，在八〇年中相繼去世；也由於義共內的親蘇派那塔(Alessandro Natta)和巴卡(Luciano Barca)，羽翼未豐，使得貝林格這時相當容易發揮其影響力。八〇年十二月，貝林格正式透過義共黨報「團結報」(L'Unità)，警告蘇聯勿對問題日趨嚴重的波蘭，採取軍事干預的行動⁽⁶⁾。「團結報」在發表的公報中表示：外力干涉波蘭，不僅對於波蘭，也會對社會主義思想，對於歐洲的民主力量，對國際和解，產生災難性的影響。假如蘇聯入侵波蘭，義共將與蘇共決裂⁽⁷⁾。這是貝林格首次對蘇聯提出的最嚴厲警告。

接着，於去年一月，貝林格宣布不出席蘇共「廿六大」，以表明義共的堅決態度⁽⁸⁾。蘇共中央對於義共這種態度的反應，是

註⁽²⁾ See Henry Tanner, "Communist Ranks in Italy Upset As Leaders Reproach Moscow," in *The New York Times*, Feb.12, 1980.

註⁽³⁾ Oriana Fallaci interviewed With Enrico Berlinguer, "How Italian Communists Walk a Tightrope," in *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27, 1980.

註⁽⁴⁾ *Spiegel* interview with CPI Spokesman Pajetta on the Relationship with Moscow, "Intervention Would Be Disastrous," in *Der Spiegel*, 9 March 1981.

註⁽⁵⁾ Henry Tanner, *op. cit.*

註⁽⁶⁾ "Italian Communists to Brezhnev: Don't Touch Poland," in *Le Matin*, 11 December, 1980.

註⁽⁷⁾ "Poland: Italian Warnings, Berlinguer Threatens to Break With Moscow The Alliance With the Kremlin at Stake for the First Time," in *Le Matin*, 11 December, 1980.

註⁽⁸⁾ 民「貝林格將不出席蘇共廿六大」，出自《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一月十一日Peter Nicholas, "Italian Party Leader May Boycott Soviet Congress," in *The Times*, 11 Feb., 1981.

故意不讓義共代表帕雅他在大會上發言，以激怒義共^④。雙方關係因此更加惡化。

八一年底，波蘭軍事當局施行軍管，危機加深。對於波蘭情勢的惡化，貝林格認為，蘇聯應負最大的責任。貝林格首先在義共黨內舉行對波蘭問題的辯論，肅清黨內親蘇派的意見，於十二月廿日發表「關於波蘭戲劇性事件之反應」的議決書，表明義共對波蘭事件的看法^⑤。此十七頁的政策性文件，說明兩點：蘇聯對波蘭事件產生負面的作用；蘇聯式的共產主義壓制人的自由，經濟上又缺乏效率，因此不適合於歐洲。八二年一月中旬，義共中央委員會召開全體會議，又以壓倒性的多數，通過貝林格對於蘇聯體制的批評意見^⑥。貝林格的發言表示：蘇聯現在所採取的政治立場和具體行動，阻礙了緩和的進程和爭取和平的鬭爭；它所推行的是一種不折不扣的強權政策；東歐各國照搬蘇聯的模式給它們帶來了消極的後果與損失。貝林格認為，以十月革命為起點的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已經結束了它的推動力，歐洲需要第三條道路^⑦。

蘇共的黨報「真理報」，於一月廿四日發表署名編輯部的文章，攻擊義共。同時期出刊的「共產黨人」，亦發表論調相同的批評文字^⑧。「真理報」的文章，攻擊義共「荒唐」，見解荒謬，誹謗蘇聯，醜化蘇聯；並說，義共中央全會所通過的決議和義共領導人在會上的講話，都談到了「同蘇共、蘇聯、社會主義大家庭各國、絕大多數共產主義運動和整個解放運動在一切極其重要的政策問題上相對抗的行動綱領。」但是，義共的行動直接幫助了帝國主義、反共主義和一切敵視社會進步事業的力量。蘇共的攻擊，大有要把義共逐出「教門」的味道^⑨。廿六日，義共「團結報」發表題為「對『真理報』的答覆——我們的立場來自事

註^④ See Kevin Klose, "Soviets Reportedly Bar Italian Address to Party Congress," in *The Washington Post*, Feb. 27, 1981; 「日葉塔說意共和蘇共在重大問題上存在分歧」，出自〔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三月一日，「意共負責人說永遠不會忘記蘇聯的粗暴態度」，出自〔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三月一日。

註^⑤ "Takeover Is Denounced By Italian Communists," in *New York Times*, 30 Dec., 1981; Carolyn Friday, "We had Nothing to do with Poland," in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15 Jan., 1982, p. 12.

註^⑥ George Armstrong, "Berlinguer dismisses the Moscow route," in *The Guardian*, Jan. 16, 1982, p. 5;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Takes New Step Away From Moscow," in *The Japan Times*, Jan. 17, 1982, p. 3.

註^⑦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Takes New Step Away From Moscow," p. 3; 「譴責蘇共對待外國黨的態度和做法」，出自〔光明日報〕，一九八一年三月廿一日第三版。

註^⑧ 此「譴責蘇共對待外國黨的態度和做法」，*Pravda*, Jan. 24, 1982; George Armstrong, "Pravda's methods 'not new,'" in *The Guardian*, Jan. 26, 1982; "Italians are denounced by Pravda," in *The Time*, Jan. 25, 1982, p. 4; "Kremlin Denounces Italian Communists," in *The Japan Times*, Jan. 25, 1982; "Soviets Renew Their Attacks On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in *The Japan Times*, Jan. 29, 1982.

註^⑨ Dusko Doder "Kremlin Excommunicates Berlinguer," in *The Guardian*, Jan. 31, 1982, p. 15.

實」一文，駁斥蘇共的攻擊^{⑤5}。「團結報」的文章表示：「真理報」文章的調子，不是那種想擺事實講道理的人的調子，並指出，蘇聯還有試圖在它周圍重建各共產黨和所有人民解放運動唯一世界領導中心的願望。「團結報」二月一日並刊登貝林格在一次會議的講話，諷刺蘇聯說，「我們認為，那種把別人革出教門的時代早就過去了。然而，我們現在又聽到了那些自認爲是負責保衛信條和對別人提出譴責，充當某種最高法庭角色的人的聲音」^{⑤6}。義共的「再生」周刊，再於二月五日發表社論，抨擊蘇聯「共產黨人」雜誌對義共之攻擊^{⑤7}。

一月初以後，蘇共官方的新聞工具仍然繼續攻擊義共，毫不示弱。不過，十三日蘇共的態度突然軟化。原因大概是出自蘇共理論家蘇斯洛夫（Mikhail A. Suslov）於一月底突然病故，克宮發生了微妙的權力變化，蘇共不願再生事端之故。因此，蘇共在十三日的「真理報」中提議，中止雙方的爭論與叫罵，並說明「真理報」於一月廿日的攻擊性文章，是「自衛」的行爲，蘇共並不希望繼續如此爭論下去而傷害了蘇共集團的利益^{⑤8}。但是義共仍不理會蘇共的軟化。義共「團結報」於十四日發表題爲「這不是對話」的評論文章，繼續駁斥蘇共的「攻擊」^{⑤9}。貝林格也在廿一日「團結報」所發表的訪問稿中，再評蘇共以中心黨自居的錯誤作法，同時重提「第三條道路」的論點^{⑥0}。

五、義共的最大野心

義共的選前策略部署，的確使義共步步高昇至有利的位置。而尤其是義共對蘇聯體制的批評，使義共處在前所未有的優勢地位。西方觀察家均認爲，蘇聯將義共逐出教門，只有使義共更像西方的政黨，更容易爲西方所接納。誠如貝林格的私人秘書搭托（Antonio Tato）所言，蘇共把義共逐出教門的威脅，「已經影響了黨的政治命運」^{⑥1}。當然，義共對蘇共進行如此猛烈的抨

註^{⑤5} The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How the crisis in Poland calls into question the Soviet model of socialism itself," *The Guardian*, Feb. 8, 1982;

註^{⑤6} 「意共『團結報』駁斥蘇聯『真理報』的攻擊」，《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一月卅日第六版。

註^{⑤7} 「貝林格反駁蘇聯『共產黨人』雜誌的攻擊」，出自《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一月三日第七版。

註^{⑤8} 「意共『再生』周刊駁斥蘇『共產黨人』的攻擊」，出自《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一月十日第七版。

註^{⑤9} See Dusko Doder, "Pravda Makes Effort to Smooth out Differences with Italy Communists," i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Feb. 15, 1982, p. 5.

註^{⑥0} 「駁斥蘇『真理報』的再次攻擊」，出自《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一月十六日第七版。

註^{⑥1} 「貝林格指責蘇聯以中心黨自居至曲意共立場」，出自《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一月廿一日第六版。

註^{⑥2} Henry Kamm, "Italian Party Untroubled by Kremlin Attacks," i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Feb. 2, 1982.

擊，也如一般新聞觀察家所言，是爲了義共自己的利益。預料，如果義大利今年順利舉行大選，義共將因此獲得比七九年還多的選票；但很難說會超過一九七六年的水準。

義共現在有更好的籌碼，來和社會主義黨談「左派的選擇」形式的政府了。

目前，義大利的政局還是三分天下的局面。義共不可能再走以前「歷史性妥協」路線的老路，做一個「不是執政黨的執政黨」。時機對它完全有利，它可以自己做個選擇。但由義共單獨執政的時機似乎並未成熟。國際的形勢、國際經濟的仍然蕭條、基督教民主黨仍有餘力反撲等等，都是它執政的障礙。同時，現在的義大利仍然有對共產黨懷有敵意的人，大部份人也仍不放心讓義共主政。在最近的將來，可能出現的情況是：在「左派的選擇」之政府形式下，由義共參政，而由社會主義黨領袖克拉克西任首相；或在「大聯合」政府的形式下，由基督教民主黨主政，而任命幾個共產黨員當部長。後一種情況的可能性似乎更大，因爲法國社會主義黨的政府證明是個可行的例子。

不過，對義共來說，他們較重要的事，倒是如何在未來與社會主義黨合作之時，慢慢的取得有利於自己的態勢，實現其建立共產政權的野心。也許，義共現在已在籌劃下一階段的策略了呢！

新書介紹：「中共違反人權實錄」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爲全面性分析中共政權迫害大陸同胞的暴政，特編纂「中共違反人權實錄」一書，內容包括中共對知識份子、宗教人士、少數民族、政治上的異己份子等迫害情形，以及近年來中國大陸人民爭民主、爭自由、爭人權運動資料，撰述兼詳，全書達同圖片約二十餘萬言，25開本，三百餘頁，歡迎惠購。

每冊實售：新臺幣 一〇〇元

郵資另加：國內——（郵掛）新臺幣一〇元

航空 美金三元

美金七元五角

郵撥帳號：三四三六號